

盐山县文史资料

盐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

目 录

点燃冀鲁边区抗日救亡运动的烽火

——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的建立与发展……………朱胜凯(1)

在战斗中发展壮大

——记救国军收复盐山打退匪军的经过……………韩立乾(20)

忆前堂战斗……………张秀岩(28)

虎狼面前显军威

——访赵胜武同志击毙日军记……………韩立乾 杨凤岗(33)

震慑敌胆的“刘二楞”

——记刘焕卿同志的英雄事迹……………杨凤岗(36)

威震敌人的“张铡刀”

——记张炳臣同志的英雄事迹……………朱胜凯 李贤珍(53)

独胆入虎血，生擒马锡鸬

——记高树阁同志……………王新华(58)

傅国光烈士传略

(附傅国光烈士日记摘抄)……………朱胜凯(63)

革命烈士——王俊峰……………张玉昆(74)

革命精神永存的马学全……………朱胜凯(77)

敌工科长王仲兴……………王新铭(81)

日寇在盐山的侵略暴行……………邵泽政 王锡堂 李泽新(88)

血花集锦(抗日英烈故事四则)……………邓焕然(101)

纪念张玉梅烈士牺牲四十五周年

悼念多才多艺的李文通烈士

肝胆忠烈为人民的宋怀芝同志

回忆王振寰烈士生前二、三事

临戮不惧的民族英雄张凤亭烈士	李泽新	田树林(121)
抗日英烈王养树的事迹		孙炳焕(126)
傅庆先历险三片断		杨凤岗(129)
革命家长韩景元		杨凤岗(134)
梓里名医——杨命三		杨凤岗(138)
土顽刘炎臣的覆灭		李寿录(142)
王连壁叛变及对盐山党组织的破坏		李寿录(146)
庆云师范学潮始末		张秀岩(150)
盐山劈挂拳初考		张砚铭(155)
庆云泰山行宫简介	孙炳焕	刘子甫(16)
盐山“忠肃祠”通考		阎书文(1620)
庆云“岁甘桥”小考		孙炳焕(165)
抗日歌曲选载	王客卿	张秀岩 演唱
	汪鸿印记谱	编者整理(168)

点燃冀鲁边区抗日救亡运动的烽火

——“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

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的建立与发展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的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发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的号召，各地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积极响应。在河北与山东交界的冀鲁边区，我党组织建立并领导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点燃了冀鲁边区抗日救亡运动的烽火。

一

冀鲁边区，包括河北省的津南地区和山东省的鲁北地区共22个县。这里地处平原，物产丰饶，但在旧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人民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19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并领导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里的人民才真正找到解放自己的道路。津南、鲁北靠近京津，是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中共津南特（工）委和中共鲁北地（特）委领导冀鲁边区人民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如泊镇九师学潮、沧县鞋业工人罢工、马颊河民工暴动、陵县农民暴动、高唐“红团”暴动等，扩

大了党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与此同时，党组织还在这一带进行了武装斗争的尝试，如张隐韬领导的津南农民自卫军起义、刘格平领导的津南革命军起义等。虽然最后起义失败了，但党组织却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中共津南、鲁北党组织的积极活动，为日后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中国国土时起，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就激起津南、鲁北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在中共津南、鲁北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奋起抵制日货，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的隆隆炮声又一次震撼了中国大地，民众的抗日浪潮更加高涨。8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寇的侵略。英雄的津南、鲁北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迅速行动起来，投入到抗日武装斗争的滚滚洪流之中。

在津南，特委委员马振华和共产党员王俊峰、邸玉栋、傅炳翰、邢仁甫、张耀曾、刘子芳、杨正泉、崔岳南、吴耀南、王连芳等四处奔波，发表抗日演说，筹组抗日武装，并动员了当地颇有名望的爱国知识分子周砚波先生和崔吉章、李子英、杨铮侯、王立潮、王昭明等各阶层进步人士参加抗日斗争。在鲁北，乐陵县共产党员杜步舟，庆云县共产党员范普权、张袖石，宁津县共产党员李广文、王建新、张策平、郑之英、张白水，无棣县共产党员石景芳、丁润生、关星甫等都在积极活动，组建抗日团体。

7月14日晚，马振华、付炳翰、邢仁甫、周砚波、杨铮侯、吕墨翰、王恩庆、王昭明等在李连村周砚波开办的学

校中开会。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国民党迫于广大民众的抗日浪潮已同意抗日，共产党由反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全国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经过这几天的工作，我们已掌握了崔吉章部约60余人的土匪改造武装，还有张耀曾30余人、王立朝30余人、李子英30余人的民团武装以及刘子芳部50余人的贩盐武装，现在趁日军尚未到达，宜迅速成立公开的抗日组织，来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和各阶层人士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会议经过一番讨论后，确定以“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做为公开的组织名称，同时建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与会人员研究了组建武装后的枪支、粮饷问题。周砚波献出几十亩地，做为购置枪械的资金，其它人也都进行了捐献。

7月15日，旧县镇北广场上人山人海。“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在这里宣告成立。周砚波、王俊峰、傅炳翰、邢仁甫、崔吉章、李子英、杨铮侯、张耀曾、王立朝、王昭明、吕墨翰等参加大会。国民党盐山县县长李天民做为统战代表也到会讲了话，并发给“救国军”小米一部，暂做军粮。大会号召广大劳苦大众和各阶层人士联合起来，团结一致，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为便于工作，大会推举周砚波为“救国会”会长，傅炳翰任秘书长。“救国会”下设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粮秣委员会和后方家属优抚委员会及锄奸部。周砚波兼任政治委员会委员长，邢仁甫读过军校，当过军阀马鸿逵的少尉副官，懂军事，被推举为军事委员长。曹培刚负责粮秣委员会，张耀曾负责后方家属优抚委员会，王俊峰任锄奸部部长。“救国会”下设6个分会，后韩沙洲为第一分会，杨马连为第二分会，圣佛为第三分会，孙家为第四分会，李

连家为第五分会，堤东为第六分会。“救国军”设总指挥部、政治部、供给处和卫生队。崔吉章任总指挥，受军事委员长邢仁甫领导。“救国军”政治部由救国会政治委员会兼，周砚波任政治部长。杨铮侯任救国军参谋长，张耀曾任供给处长，杨正泉任卫生队长。救国军下辖两个大队，崔吉章任第一大队大队长，李子英任第二大队大队长。

二

“救国会”和“救国军”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边区人民的抗日斗志，各地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加入“救国会”，使其规模日益扩大。首先是宁津县的抗日救亡组织被编为七分会，随后，又建立了八分会（地点不详）。盐山东部高湾、崔柳杨一带的“抗日五人团”组织被编为九分会。在无棣县建立了十分会，在新海县羊二庄建立了十一分会。十二分会地点不详。庆云县的抗日组织被编为十三分会。“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因此改称“华北民众抗日救国总会。”各分会在做好宣传发动工作的基础上，开始重点筹集枪支，募捐资金，组建抗日武装，充实“救国军”。各分会筹集武器的主要方法，一是收集民间遗散枪支，二是借用当地各地方武装的枪支，三是发动群众打大刀片，造土枪土炮。在各救国分会的宣传发动下，许多青壮年报名参军，队伍发展很快。8月13日，乐陵杜步舟、周凯东在黄夹镇北街举起抗日义旗，队伍有130余人，步枪60多枝，大刀50把，活动在乐陵乡村。接着宁津李广文、王建新、张策平、郑之英组织了100余人的武装到旧县加入“救国军”，编入二大队。崔吉章、刘子芳在旧县、堤东一带分别组织了100余人的武装编入一大队。邢仁甫、邸玉栋、张耀曾等到高湾一

带组建特务团。1939年9月24日，沧县失守，国民党乐陵县政府官员和当地的地主、富商纷纷携眷南逃。“救国军”派王建新、郑之英、张策平率其部进驻乐陵城，安定民心。这时，国民党韩复榘部驻乐陵三间堂，某营副官刘景良带100余人枪到旧县投奔“救国军”。总指挥崔吉章未与其它人商议，即决定让刘景良当“救国军”司令，并建立司令部。10月初，日军侵占盐山，随即兵分两路，向南进犯。一路经旧县、乐陵，一路经庆云、阳信，合围惠民。驻旧县的王昭明和驻乐陵的王建新、张策平、郑之英及部分武装被敌冲散。日军过后，“救国军”侦知敌人在乐陵城内只留下一个伪县长和几十个伪军，遂派一大队攻打乐陵。伪军一触即逃，乐陵复为我所得。刘景良率救国军司令部随即进驻，并将“救国军”建制改为团。一大队改为一团，崔吉章任团长，傅炳翰任政治部主任。二大队改为二团，李子英任团长，李广文任政治部主任。10月中旬，各地组建的抗日武装向旧县、乐陵集中，无棣石景芳、关星甫、丁润生等带领190余人到旧县编入二团。宁津张策平、郑之英等组织的第二批武装100余人也到旧县编入二团。乐陵杜步舟部200余人与盐山杨铁珊、王恩庆组织的武装合并，编为第六团（因刘景良诡称其在惠民还有三个团的武装，故三、四、五团的番号给了刘景良），杨铁珊任团长，王恩庆任付团长，杜步舟任三营营长（不久改任六团团长）。10月18日，邢仁甫、崔岳南、范普权、路牟班率新组建的特务团150余人到达乐陵，路牟班任团长，马振华任政治部主任。至此，“救国军”已发展成一支拥有1200余人的武装。

“救国会”和“救国军”的迅猛发展，充分体现了边区

人民反抗外族入侵、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强烈要求。但在同时，由于局势混乱，“救国军”在组建过程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成分相当复杂。有些人是怀着个人目的参加抗日，这给“救国军”的发展造成了严重障碍。

“救国军”在旧县、乐陵一带集结后，内部即发生了领导权之争。投机革命的刘景良不愿受军事委员长邢仁甫的统辖，企图独霸“救国军”的领导权。土匪出身的崔吉章怀着个人野心与刘景良互相勾结，架空邢仁甫。邢仁甫到达乐陵后的第二天，刘景良对部队训话，一副傲慢面孔，颐指气使，根本没把站在旁边的军事委员长放在眼里。崔吉章直接向刘敬礼，请刘训话，把邢仁甫晾在一边。看到这种情况，许多同志感到气愤。当天晚上，以军事委员长名义召开干部大会，严厉批评了刘、崔二人的错误行为，刘景良当时非常孤立，崔吉章也忐忑不安。会后，一些干部曾建议驱逐刘景良，取消他的司令部。但由于未做具体安排，拖了10多天，给刘景良造成可乘之机。他迅速从其亲信队伍中调来20余人的手枪队，把司令部全换上他的人。不久，刘景良提出带崔吉章的一团去攻打惠民，扩大队伍。“救国会”和“救国军”的领导人明察了他们企图背叛“救国军”的用意，将计就计，派李子英的二团跟随刘景良行动，密嘱李子英在去惠民途中将刘景良消灭，如不成功，即把他甩掉，将队伍带回。不料二团受了刘景良的欺骗，未能按计划行动。部队到达阳信后，刘景良带其亲信入城，却将二团置于城外驻守。这里环境复杂，土匪横行，与当地的党组织又无联系，部队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二团被迫后撤，途中遭到封建道会门——小红门的袭击，损失惨重。刘景良占据阳信后，与国民党沾化县县长梁建章勾结，建立了国民党山东省第五特派员公署，刘

景良任公署特派员兼保安司令，从此走上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10月下旬，中共山东省委派于文彬以鲁北特委书记身份来到乐陵，在许家小学召开会议，建立了边区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鲁北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鲁北特工委”，一说为“冀鲁边工委”），于文彬任书记，马振华任组织部长，赵明新任宣传部长，王俊峰任委员，邸玉栋任特派员。

于文彬来边区后，针对“救国军”中人员混杂，党的力量薄弱的情况，重点抓了党组织建设。先是在各个连队建立党支部，积极发展党员，随后又于10月底在盐山县刘集村召开会议，重组“救国军”指挥机关，加强党的领导。会前，党内决定选举邢仁甫为“救国军”司令，而野心不死的崔吉章也拉拢了部分人选举他当“救国军”军长。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在关键时刻，于文彬站起来慷慨陈词，号召大家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警惕有人闹派别、搞分裂。一番肺腑之言使受崔吉章蒙骗的人受到教育，会议一致选举邢仁甫为“救国军”司令，崔岳南为“救国军”政治部主任，于文彬为政治部副主任。“救国军”下设八大处，书记处处长张袖石，付官处处长宋萍，军法处处长王仲兴，军医处处长杨正泉，交通处处长刘全禄，军需处处长张耀曾，兵械处处长吕墨翰，参谋处处长周凯东。

刘集会议的召开，纯洁了“救国军”的领导班子，保证了党对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为“救国军”的发展扫除了一个障碍，此后，部队开始主动出击，打击敌人。

1937年11月某日，庆云县伪政府顾问大盐谦治乘一辆吉普车由天津赴庆云上任，行至望树镇太平店村附近，被刘子芳率领的一团一大队伏击，大盐谦治和司机被生俘

(后枪毙)，缴获的汽车藏到北卢村一个砖窑里。第二天，30名日军到这一带搜寻，未果而回。

同月，被日伪任命为“华北自治联军”副总司令的刘佩臣率1000余人由沧州南犯，夜宿望树镇北五铺、叶茂李一带。“救国军”司令部侦察敌情后，趁敌不备，夜间突然发起攻击。战士们猛打猛冲，很快击破敌营。但是，由于年青的“救国军”战士战斗经验不足，各部分之间不能互相协调，当敌人组织反扑后，战士们被迫撤出，五、六名战士不幸牺牲。战斗结束后，这股伪军趁机从旧县、庆云中间插到乐陵。守城的崔吉章部没有充分准备，驻守西关外的中队长张房山首先率部投降，乐陵随即失守。崔吉章带几十人跑到惠民南面的清河镇，不久即投靠伪“满州自治联军”独立旅旅长刘芳庭，背叛了革命。其部中抗日分子不满崔的行为，又设法回到“救国军”中。崔吉章后来被刘芳庭枪毙，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这时，寒冬已到，“救国军”给养发生了严重困难。由于“救国会”和“救国军”建立以来，长期驻在旧县、乐陵一带，未向四周扩展，使当地人民负担过重。其次，“救国军”周围有许多地方势力，他们以国民党为正统的观念很强，视“救国军”为“土匪”，拒绝供应军需。更有反动的地主武装，企图吞并这支队伍，故意“卡脖子”。这使“救国军”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没有粮吃，没有衣穿。此外，刘景良、崔吉章的叛逃，五铺战斗的失利也影响了部队的士气。一些人开始动摇，有的说回家拿棉衣，有的要回家过年，更有人不辞而别，自谋出路，部队开始大量减员。至12月底，“救国军”由原来的1200余人锐减到不足600人。这时，中共鲁北特工委已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

系。而在“救国军”周围，盐山的刘彦臣、无棣的张子良、吴桥的张国基等地主民团武装以及伪军刘佩臣都虎视眈眈。

“救国军”形势危急！存亡问题已经严峻地摆在“救国会”、“救国军”领导人面前。

三

1937年12月底，王昭明在庐山为“救国军”领来了“国民革命军敌后别动总队第31游击支队”的番号。王昭明是盐山县张沙村（今属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曾参加“救国军”的组建工作。自10月上旬日军经旧县、乐陵南下，他与王建新等被敌冲散后，即独自向南出走，在济南遇到了他的同学齐玉峰、刘金坦、王炳烈、李丹桂。这四人是受国民党CC系（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分子康泽的派遣到沧州一带组建武装的。听了王昭明介绍的情况，他们又一起返回江西庐山，找到康泽，说明情况，要来了“国民革命军敌后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以下简称“三十一支队”）的番号，并委任邢仁甫为司令，王昭明为副司令，王炳烈为参谋主任，齐玉峰、刘金坦、李丹桂为参谋。五人一起经济南返回冀鲁边区。中共鲁北特工委和“救国会”、“救国军”领导人在盐山东部杨小营村召开会议，研究是否接受这一番号。于文彬、马振华、邢仁甫、崔岳南、范普权、周凯东、刘子芳、李子英、杜步舟、路牟班、王昭明等参加了会议。大家围绕“救国军”的前途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多数同志认为接受国民党的委任可以使“救国军”合法化，有利于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根据地。最后大会形成决议：第一，接受“三十一支队”番号，但队伍仍由共产党领导，并在基层设政工干部。第二，为扩大影

响，将“救国军”改建为三个路和一个特务团。一路指挥刘子芳，副指挥郭盛云，政治部主任周玉峰；二路指挥李子英，付指挥姜海清，政治部主任李广文；三路指挥杜步舟，副指挥周凯东，政治部主任关星甫；特务团团长邢仁甫（兼），副团长路牟班，政治部主任马振华。增补王昭明为“三十一支队”副司令。随王昭明一起来“救国军”的王炳烈、齐玉峰、刘金坦、李丹桂四人被张耀曾等以供给困难请他们回去找康泽要军饷的名义支走，保证了共产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

杨小营会议后，为了摆脱困境，提高部队士气，扩大“三十一支队”影响，司令部经过周密策划，于1月底发动了对盐山城日、伪军的围攻战。当时盐山城内驻有日军一个中队100余人，伪军500余人，武器精良，弹药充足。

“三十一支队”虽有五、六百人，但战斗经验不足，武器装备也差，如果强攻盐山城，取胜的希望不大。为此，“三十一支队”采取了虚张声势、日夜骚扰敌人的战术。白天，队伍分成若干小组，高举红旗，在盐山城周围村庄来回穿插，时隐时现，使敌人搞不清我军实际兵力。夜间，“三十一支队”派出若干小分队，向城内打冷枪，投手榴弹，擂鼓呐喊，佯攻城池。日、伪军不知虚实，坐卧不宁。第二天，全副武装的日、伪军乘4辆汽车对城周围村庄进行扫荡，被“三十一支队”在一树林中伏击，敌人扔下几具尸体，逃回城内，再也不敢出来。“三十一支队”继续展开攻势，搞得敌人疲惫不堪。第四天夜间，敌人仓惶出逃，奔向沧州。

“三十一支队”在城西范庄布置了伏击，但由于购置的子弹多是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扔在水中又被群众捞起的，十发子弹只能打响一、两发，所以眼看着敌人的汽车从阵地前急驰而

过，没有办法。当晚，“三十一支队”进驻盐山城，搜剿残敌，并活捉了叛徒王连璧。在敌军指挥部，战士们缴获一张电报底稿，文称“共匪邢仁甫部千余人，此外尚有游击队三千人，声势浩大，不可抵御。”可见敌人正中我疑兵之计。

“三十一支队”随后开仓放粮，救济百姓，并建立了盐山县政府，委任周砚波为县长。当时正值1938年春节，各村群众杀猪宰羊，进城劳军，数百名青年报名参军，部队士气空前高涨。

“三十一支队”占领盐山，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提高了部队的声望。但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固守盐山也是不可能的。一方面被赶走的日、伪军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卷土重来。再者原盐山的保安队队长刘彦臣带领的6个大队800余人就驻在离县城50里远的高湾街。刘是盐山城里人，在当地有钱有势，也不会容忍“三十一支队”占领盐山县城。根据这种情况，于文彬等人提出“主动撤出盐山城，开辟新地区”的建议，这是正确的，但由于部队乡土观念严重，许多人不愿离开家乡，邢仁甫、周砚波等也不同意撤出，故未能通过。

果然1938年2月7日，驻沧县的伪“满州自治联军挺进师独立旅”旅长刘芳庭（绰号刘小个子）率800余人进驻盐山城西西三里、谢园、城北红庙等10余村庄，准备向盐山发动进攻。同时，刘彦臣也率队进至盐山城东南马牛、东三里一带，企图坐收渔利。当时盐山城外，南面和北面都是开阔地，东面和西面与村庄连接，西南城外有一些直通城下的壕沟。刘芳庭选择西南城角为突破口，以西城门为进攻重点。战斗主要在夜间进行。刘芳庭部多是土匪，组建不久，纪律涣散，虽然武器较好，但要攻下墙高沟深的盐山城并不容易。而这时的“三十一支队”士气旺盛、斗志高

昂，凭借易守难攻的有利条件，用步枪、洋炮、二人抬及自造的手榴弹打退了刘部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至11日，战斗已进行了5天，刘芳庭仍未取胜。但是“三十一支队”的物资消耗也很大，弹药已经不多，如果战斗再继续下去，盐山城就有可能失守。与其把盐山城丢给刘芳庭，还不如让给刘彦臣。“三十一支队”领导认为，刘彦臣虽然不是我们的朋友，但他毕竟还打着抗日的旗号，还没有投降敌人。把盐山城让给刘彦臣，即可以使“三十一支队”摆脱困境，使盐山城免遭屠戮，又可以团结刘彦臣，与之结成统一战线，有利于抗日。于是，“三十一支队”派人出城与刘彦臣谈判。刘彦臣正对盐山城垂涎三尺，当即达成协议：刘彦臣部进城，协同“三十一支队”共同抗击刘芳庭。击退刘后，盐山城由刘彦臣驻守。12日，刘彦臣率部进入盐山城，并调来地方民团武装仇鸿印、韩树元、左清甲、郝厚周等参战。14日，刘芳庭骑马从西三里去红庙，被“三十一支队”某部战士李子岐从城墙上一枪击中腿部，落下马来。这伙土匪组成的武装连日攻城不下，士气已十分低落，此时见指挥官败阵，树倒猢猻散，四处逃窜，各奔东西。刘芳庭只带不足百人的队伍狼狈逃往东北海堡一带。盐山保卫战终于取得胜利。经过这次战斗，“三十一支队”经受了考验，取得了经验，在当地人民群众中也树立了威信。

战后，“三十一支队”按协议撤出盐山城，在叶茂李村休息10余天，又进至庆云城东南三马家，虚张声势，做出进攻庆云的假象，实则侦察无棣、阳信敌情。当时无棣城有伪军数百人，但战斗力并不强。而我党在无棣的群众基础较好，中共无棣县委的石景芳、丁润生、关星甫等经过周密侦察，根据敌军布防情况，已经画出了进攻路线图，为攻克无

棣城创造了条件。2月23日，“三十一支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无棣城。特务团主攻北门，一、二、三路分别攻打东、南、西门。敌人顽固抵抗，拒不投降。特务团突击队队员头顶湿棉被冲到城下，把在附近一杂货铺里弄来的一桶煤油倒在城门上，点火烧开了北门。特务团战士随即攻入城内。敌人见此门失守，阵脚大乱。很快南门、东门、西门亦被攻克。战士们冲进城内，击毙了负隅顽抗的伪无棣县警备队队长王岐山，活捉了伪县长马培伦，毙、俘伪军4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弹药若干，装备了部队。随后，建立了无棣县政府，委任邢朝兴为县长。3月初，“三十一支队”除留下第三路在无棣扩编队伍外，其余则向西挺进，在庆云县扳打营镇消灭了一支与我为敌的地方保安队，缴枪100余支。这时，从盐山县崔口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中共鲁北特工委书记于文彬不幸逝世。于文彬同志是河南息县人，1937年10月由山东省委派来冀鲁边区工作。他既是优秀的政工干部，又具有军事才能，为“救国军”摆脱困境、开创新局面做出了贡献。在盐山保卫战期间，他因手枪触地走火而负伤，转移至崔口治疗，终因医治无效而逝世。中共鲁北特工委和“三十一支队”司令部在扳打营为于文彬召开了追悼会。会后，领导同志开会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这时，邢仁甫提出把队伍拉到比较富裕的盐山四区去休整，建立根据地。四区在盐山的东北部，我党在那里基础薄弱，而那里的民团头子孙仲文反动狡猾，在当地很有势力。抗日队伍到那里去，难以站稳脚跟。范普权等据理力争，终于说服邢仁甫，队伍继续向西进发，解决了南皮县的董村、马村、王木匠村三个据点的数百名伪军，缴获枪支弹药若干。这时，留守无棣的“三十一支队”第三路及新组建

的无棣县大队也来到董村，无棣县政府自行解散，县城由地方武装张子良进驻。“三十一支队”在董村镇进行休整。

4月下旬，中共河北省委派杨靖远、李启华、史甄、赵焕文、杨希玲五人来冀鲁边区工作。自1937年底中共鲁北特工委与中共山东省委失去联系后，马振华即派政治交通员李广文去找河北省委。李广文先到景县，找到津南工委书记赵博，经赵博介绍，又到天津，几经周折，才找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姚依林，向他汇报了冀鲁边区的情况。河北省委研究后决定派得力干部到边区工作，并指示今后冀鲁边区由驻南宫的冀鲁豫边区省委直接领导。杨靖远等分两批分别由马振华和邸玉栋率领到达董村。杨靖远任“三十一支队”副司令，负责军事领导；李启华任“三十一支队”政治部副主任，主持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史甄、赵焕文、吕器（又名杨希玲）暂在“三十一支队”政治部做宣传工作。这样，“三十一支队”又与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干部战士信心倍增。杨靖远等同志来后，加强了对“三十一支队”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同时也积极进行地方党组织的重建工作，并派出李广文到南宫与冀鲁豫边区省委联系。

4月底，“三十一支队”又解放了庆云城。当时庆云的城里驻有“华北自治联军”一个营，由于粮饷接济不上，这伙伪军靠外出抢粮度日，加之营长于之岩专横跋扈，更引起部下的不满。连长李栋臣看到“三十一支队”连战皆捷，队伍壮大，遂派人和“三十一支队”联系，表示要立功赎罪，协助“三十一支队”解放庆云城。4月29日夜，间，“三十一支队”二路一营营长刘泉正率其部和特务团突击队赶到庆云。副营长李之贞带一个连在隔津河南岸待命，其余部队待城楼上李栋臣打出信号后，即拉开护城铁栅栏，架起云梯，